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作家专卷

浩岭（上）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浩岭（上）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血 炕	(1)
黄河从市中流过	(221)
扶 贫 县	(331)
女 老 师	(451)

血 炕



第一章

1994年4月17日 G省L南A县城

节气将近“谷雨”，在王余成的记忆中，这个虽在长江流域但却不算江南的地方，也早已是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了。不错，麦苗足有半尺高，就是当地俗语说的已经“盖住老鹅”了；杨树、柳树都婆娑着一身葱绿；公路旁坡坝上的野桃杏花已凋谢，生出指甲盖大的嫩叶，高大的泡桐树缀满绛紫色的繁密的花朵；雪白的狼牙刺，火红的山丹丹也渐次开放。然而，从前天他到这里时天气就起了变化，密布的阴云和连日不断的小雨，给这个即将送走春天的小县城带来了几许料峭寒意，空气凉冰冰的，地上落满了桐花，到处是一片冷清落寞。人们都重新穿上了毛衣和线裤，同时盼望着这种被称作“倒春寒”的坏天气快点结束。

王余成更是心急难耐。

他这次来A县是为了弄清一条重要的党史线索。那是前不久在省上召开的党史工作座谈会上，王余成偶然得知：八四年整党中清理“三种人”，在有关资料里



浩岭卷

面曾发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省委第一书记侯述之的一些遗物，其中在本人的一份给造反派的交待材料中提到，1936年9月，他随红二方面军红六军长征到达A县，撤退时受伤，隐藏在一个名叫白马洞的地方，次年1月建立了中共L南特委云屏党支部，地点是白马洞王女子家。作为L南地委党史办副主任，王余成一下子就掂出了这条线索的重大价值，他甚至显出几分震惊和激动。因为L南地区一级的党组织最早是1948年11月由中共G省工委作出决定，翌年2月于徽县正式成立的中共L南地下工委。而L南最早的基层党组织是成立于1938年12月的徽县党小组。这已经是L南党史的定论。现在却冒出了一个成立于1937年1月的云屏党支部，并且前面还冠有“L南特委”。假如这是真实情况的话，那么不仅L南第一个基层党组织的建立时间要向前推两年，L南地区工委（特委）的历史更要提早十二年了。这意味着L南党史将要重写，起码也要作重大修订。

这份材料现在保存在侯述之同志的爱人丁苏同志手边。丁苏也是一位老干部，离休前的最后一茬职务是中顾委委员、省顾委主任，已于不久前举家迁往北京居住。王余成即刻就要专程去北京访问丁苏，亲眼看看那份材料。不料电话一联系，北京那边回答丁苏带着残疾的女儿去南方疗养去了。他又去请教省上一位据说亲眼



看过这份材料的党史专家，这位专家说，材料确属侯述之同志的亲笔，是侯述之同志平反昭雪后从原专案组的档案中抽出来的。按当时的有关规定，这类材料应退还本人，所以就交给了丁苏同志。里面关于1937年1月他在白马洞王女子家建立中共L南特委云屏党支部这段话，的确是明白无误的。

回到地委，他立即给A县党史办打了电话。很快便得到县上同志的答复，说是他们经过调查，云屏乡并无白马洞这个地名，也没有王女子这个人。至于红军伤病员的事，从没有人听说过，更谈不上地下党组织。这里最早的党员是1949年8月解放前夕由中共A县地下工委发展的。

这似乎是意料之中的。搞了这么多年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几乎没有一件事情、一条线索是顺顺当当清清楚楚地完成的。岁月的尘封，历史的迷雾，有时好像是动不得的，一动就灰尘扬起云雾弥漫反而什么都弄不清了。并且历史也好像常常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你可以观察它、分析它、猜测它，但却不可以揭开它，触摸它。它有自身的忌讳，有独立的性格和尊严。王余成算不上是专家学者，但对这些也不乏深切的感受。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次王余成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沉重艰涩的感觉，好像自己在L南这片土地上搞了这么多年的党史



浩岭卷

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到头来却仍然是一团乱麻。更使他内心不安的是，这条重要线索的发生地点居然是在 A 县！

王余成就是 A 县人。

他与共和国同龄，生下来就不知父母，被一个皮匠收养，住在县城北街的一所破烂房子里。他一岁不到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年这位皮匠养父上了前线，将他托付给邻居家。这家人后来因祸家破人亡，他便被送进政府办的孤儿院，一直到上学、参军。1975 年转业到地区档案馆工作，后又调地委党史办公室。这次他本来打算一到县上立即就去云屏乡，亲自查找“白马洞”这个地方和“王女子”这家人，决心要搞出点眉目。不料却遇上了这样的天气，县城通往云屏乡的简易公路因消冰水猛涨而中断，恢复通车起码得在三四天以后。今天早上他实在急得不行了，提出要步行去云屏，但被县上的同志劝住了，他们指着东南方那云罩雾锁的重重大山说，云屏的雨肯定比县城还大，河也涨了，绕道爬山走小路也得两三天，还不安全，劝他耐心等着。

吃过早饭，他忽然想到，何不去北街他儿时住过的那个小院里看看？

县城的面貌与当年相比自然是大大地不同了，但北街旧城墙附近那片平民大杂院还依稀可辨。他印象最深



的那株老臭椿树居然还站在那里，黑色的粗大的躯干一多半生命已经撤离，全树几乎空空如也，只是顶端有三五股枝桠挑着七八片嫩叶，在春天里显得丑陋而凄凉，这形象很像一位老朽透顶而又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衰翁。他的那位他根本没有任何印象的皮匠养父当年住过的房子早已不复存在，但他仍然记得将他抚养了两年多的那个邻居的家。尽管后来房子频频易主，也多次修补，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坐西向东，麻条石台阶，青瓦筒兽脊，被风雨剥蚀得满目疮痍的门窗。他上小学时常来这儿玩，因为院子里有他的同学。当时臭椿树枝繁叶茂，树下有一口辘轳井，夏天树上知了声如潮，人们都喜欢坐在树下井口边乘凉。他一来，老人们难免就要说起那段往事。说这院子其实也就是他的家。听得多了，他脑海里也就牢牢地留下了印象。情形大约是这样：1949年初冬，在宝鸡、天水已经解放了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如决堤的洪水般经由L南向四川退去。A县城一片兵慌马乱，有钱的人都准备逃跑。忽一日有一个神情憔悴的外地皮匠出现在县城街道上，身上背着一捆捆皮带、皮绳、皮包和鞣生皮的用具，怀里还揣着一个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婴儿。这皮匠转悠了两天，就在这椿树院租了间房子住下来，他说这婴儿是他在双石铺随逃难的人群往A县走时，一个女人塞进他怀里



浩 岭 卷

的。那女人转身就跳了嘉陵江。院子里的人觉得这皮匠是个好心人，就都帮着他照顾这孩子。皮匠姓余，叫余升贵，他说这孩子塞进他怀里时，衣服角上写着一个王字，显然是父母的姓氏，所以皮匠就让这孩子姓王名余。这余皮匠似乎压根儿就不打算在此地久住，租房子每次租期都不超过半年。因他有文化，还有制革和养马技术，解放后政府就动员他参加工作，他推辞不干。抗美援朝开始后，按说他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可以不应征，他却积极报名去了朝鲜前线，将孩子托付给隔壁姓成的一家人。于是这孩子的名字后面又加了一个成字，变成了“王余成”。余皮匠一去杳无踪影，成家后来也丁口无留，四岁的王余成便成了人民政府办的孤儿院的首批入院孩子。

现在，这座房子里住着一户家境贫寒的人，王余成进去时，女主人正领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在制作一种装皮鞋的盒子，家里堆满了硬纸和制作好并贴上标签的皮鞋盒。王余成先自我介绍了一下，那女人便忙不迭地让座、递烟、沏茶。王余成叫她不要麻烦，继续干她的活。闲谈中他得知，这房子早就是公房了，属房管局管辖。女主人一家原来在乡下，丈夫当了三十年小学老师，转遍了大半个县，前年才调进城。他们有三个孩子，她没有工作，丈夫在城关二小当教导主任，一月也



就三百来元，还常常拖欠不发，家里生活很紧巴，所以她从私人办的皮鞋厂揽些活来，做一个鞋盒可挣三毛钱。女人诉了一阵生活的艰难，又说起这房子的事情，说是她丈夫的许多学生现在都是书记、局长什么的，都住着洋楼或小独院。她一家调进城后，在二小一间油毛毡房里住了大半年，最后县教委主任亲自找了几回县长，才跟房管局要了这座破瓦房，一月还要掏十几元房费。最近房改，又动员他们花三千元将这房买下，他们哪来这么多钱？再说这房破成了这样儿，能值三千元吗？她问王余成以前是不是就住在这座瓦房里？

王余成点点头，说：“住过，当时这房的房主姓成，成功的成。”

“成功的成？”女人忽然停下手里的活，“是不是叫成明宽？”

“记不得了”，王余成摇摇头，“那时候我才三四岁……”

女人进到里间，翻动了一阵什么，拿出一封拆开的信，递给王余成，说，“是不是这个人？”

王余成接过这封挂号信，收信人的地址写得有些奇怪“G省A县城北街城墙根不远，大臭椿树院子，西房主人成明宽及后代亲属收”，寄信人地址是：新疆新源县肖尔布拉克农4师3团12连。



浩岭卷

他取出信瓢，这是用工整的毛笔小楷写的一封信，竖式，夹杂着不少繁体字。全信如下：

明宽吾兄：

一别四十余载，音信茫茫，死生未知。弟自离开 A 县，赴朝鲜数年，颠沛流离，飘荡无定，后安身于新疆新源农四师。近十几年来曾数次写信联系，均无回音。当年我离开 A 县时，将身边一岁半养子王余托付予兄一家，此子若在，想来也已成家立业。不知他情况如何？他生身父母找过他否。弟远在新疆，山隔水阻，天路迢递，且已近古稀之年，耳背体弱，难以亲自查寻。万望兄委托可靠之人，找到此子，吾当有要事相告。此乃弟余生最大之心愿。不明此子下落，弟虽九死而且难一瞑矣。

弟余升贵（余皮匠）顿首

一九九四年三月廿日于新疆新源

信没有看完，王余成的心和手都已颤抖起来。他这样一个生于战乱之中的孤儿，全靠党和政府抚养成人，



他的童年回忆，人生情怀以及岁月梦境，全是集体、组织和社会，没有一般人的父母舐犊、兄妹手足的亲情关系。但他对这个余皮匠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思念之情，尽管他只收养了他一年半，这里面仿佛有着某种说不清的宿命的因由。他也动过寻找这位养父的念头，但经验和理智告诉他这只能是空耗时力，白费心劲。尤其在搞了这么多年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后，他明白沉入历史海底的东西是很难打捞的，即便捞上来也面目全非。这位养父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也许以另一种身份面貌活着，尘寰茫茫，往事纷纷，一切的一切谁说得清？他万万没有料到，斯时斯地在这样偶然的情况下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这位养父的确切消息。

“听院子里人讲”，女主人继续干她的活，“好几年前就来过这样的信。这封信是前几天才送来的，孩子他爹拆开看了，说是找人的，他思谋着要给写信的人回一封信，就说这里没这个人，可他忙得很，还没顾上哩！”

王余成拿出自己的名片，说：“孩子他爸回来，请你把这张名片给他。这封信我拿走了，以后要是还有什么消息，请你们跟我联系。”

他已在心里作出决定：待这里的事情一办完，他就立即回地区，然后去新疆。

回到县政府招待所，县委党史办主任老刘正在焦急



浩岭卷

地等他，说是刚刚接到地委的电话，叫他火速回地区，县委的小车正在加油，马上就送他走。

“什么事？”他有点吃惊。

“什么事没有说”，老刘说，“电话是地委秘书处打来的，说是奉了杨书记的指示。”

杨书记是地委一把手，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不会去请他下指示的。王余成不再说什么，赶紧收拾东西打道回府。

1994年5月12日 省城

一辆半新不旧的“伏尔加”轿车驶出G省农业大学，在著名的安宁桃乡十里大道上奔跑。初夏时节，黄河两岸花红柳绿，桃夭槐茂，一派迷人风光。王余成仰靠在后座上，摸出一支“莫高”烟，却许久没有点上火。他的思绪还停留在刚才与这位教授的交谈中。

访问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可是却没有获得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这位陈教授是他的A县同乡，名叫陈篱，现在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草原学专家，明天就要去北京，然后飞赴加拿大多伦多，参加国际草原学年会。他的历史很清楚：1937年8月出生于G省A县，父亲陈敬容，云屏乡的破落地主，早在1946年就变卖了乡下的全部田产，到县城靠出租几间店铺过活，解放后被定为小工



商业主，1953年在私营工商业改造中病亡。他1950年小学毕业，后到天水上中学，1956年考入西北农学院。这位教授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名叫陈筌，当过省外贸易厅副厅长，后任省外商投资管理局局长，硬梆梆的正地地干部，不幸三个月前以收受五十万美元贿赂和对上级行贿十五万美元的罪名被逮捕。教授说，他们弟兄两个从小志趣相异，1956年一同从天水一中毕业后，陈筌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他们同在省城生活几十年，彼此很少来往。至于那位破落地主兼小工商业主的父亲，大家都知道他并非他们的生身之父，加之很早去世，所以记忆淡漠。

“你们是怎么知道他不是你们的亲生父亲的？现在能不能肯定你们是侯述之同志的亲子？如果能肯定，那么你们的母亲是谁？”

教授略微沉思了一下，他的脸偏向客厅朝南的阳台大玻璃窗，透过黄河上空的这片宽广的空间，可以看见初夏的南山在明丽的太阳下泛着青灰的光晕。

“说来话长”，陈教授的声音很低缓，并且带上了几分酸涩和悲凉，他回过脸来，但并没有看拿着笔和本子的王余成，也没有理睬放在一边的小录音机。他扶了扶眼镜，眼睛盯住对面墙上的一件东西，那是一根盘绕起来的小指粗的芦苇根。刚才王余成已听过介绍：陈篱大



浩岭卷

学毕业刚参加工作，到河西走廊采集植物标本，挖出了这根长达45米堪称世界之最的芦苇根，他把它小心地保存下来，装入镜框，挂在客厅墙上，成了一件独特的工艺品。“简单地讲是这样：我父亲有两房老婆，大房没有留下后代，搬进城以前就死在云屏了。二房，也就是把我们拉扯大的妈妈，她文化大革命中才去世。我们弟兄俩虽然是双胞胎，但从小身个、相貌便不一样，我比陈筌要高，陈筌比我胖，到现在还是这样。所以在我们八九岁以前，我们一直以为陈敬容是我们的亲父亲，我是大妈生的，陈筌是二妈生的。四六年秋季，父亲领上二妈和我们兄弟俩从云屏搬到了县城，我们同时进了县立小学。解放后不久，在西北局当组织部副部长的侯述之同志，曾来A县寻找1936年长征途中救护过他的贫苦农民，找来找去，找到了我们家。当时的县委书记亲自出面，调查了很久，说是我们兄弟里面有一个是侯述之同志养伤期间的亲生子。直到这时候，陈敬容才公开说我们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要认都认走。这样就不了了之，显然侯述之并没有让他们给找一对双胞胎。后来又传说我们两个里面有一个是国民党大军官的孩子。那时我们已经上中学了，什么都懂了，我们就问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陈敬容和二妈都说，我们是一母所生的双胞胎，要是都是，要不是都不是，别听那些闲



传。问到我们的母亲，他说早就死了。不久陈敬容病逝，临死前他把我俩叫到跟前，要我们好好孝顺二妈，说我们的亲生父亲终究会找到我们的。”

说到这里他看着王余成淡淡地笑了一下，王余成感觉到那镜片后面的深邃的目光中所透出的隐忍和沉重。

“从上中学申请入团那个时候开始，这件事就一直纠缠着我们。文化大革命中，一忽儿说我们是国民党的狗崽子，一忽儿又说是共产党的红五类，最终也没下个结论，我们的家庭出身栏里始终填的还是‘城市小工商业主’。这十来年没人问起这些事了，你这是第一次。”

王余成的本子上并没记多少。陈篱讲的这段经过其实大体他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刮十二级台风，清理阶级队伍，教授的那位二妈在 A 县城跟数百上千的“残渣余孽”一起被游斗，那些场面王余成都亲身参加过。他执意要陈教授临出国前腾出半天时间和他交谈，共同挖掘故乡的那段历史，是希望能从他这里得到更有价值更关键的材料。

1936 年 9 月红二方面军红六军攻占 A 县城，侯述之当时是余秋里任政委的十八师的一个营教导员。10 月初红军撤离 A 县北上，在云屏河一带与“国军”主力发生激战，十八师是后卫部队，伤亡惨重。侯述之受伤后被安置在一贫苦农民家，直到西安事变发生，他才